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根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2933/05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1938—1945年

[美] 迈克尔·沙勒 著

郭济祖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 2 0 1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315

---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sup>1</sup>/<sub>32</sub>

198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1 千

印数 11,900 册

印张 10<sup>1</sup>/<sub>4</sub>

定价：1.30 元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迈克尔·沙勒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曾在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任教，1974年获得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作者认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对华“制订了一项不幸的政策”，不但“把自己困在这项政策里面，从1938年到1945年达八年之久”，而且从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及其后在亚洲兴起的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所应采取的政策格局”仍受原来“政策框框的限制”。作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他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从维护美国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总结美国对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当初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性质”，未能吸收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意见而采取了偏袒国民党一方的决策，以致最后“丢失”中国。作者对此是抱着一种惋惜的心情。

本书有一定的特色，书中“探讨”了这样几个“基本的和未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的保守民族主义要向关注亚洲前途的美国设计人员要求帮助？”“是什么因素使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抱有偏见？”“为什么美国各派力量会卷入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去？卷入的深度又如何？”“如果罗斯福总统或史迪威将军的政策得到实现，会不会对中国的进步有所帮助？或者是否将导致现代军国主义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实行更‘有效的’专政？”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些美国学者是怎样研究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其所引述的许多史实和资料，也可供我们参考研究。

##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的形象	5
第二章 经济遏制, 1938—1940年	21
第三章 美援与中国政治, 1939—1941年	44
第四章 美国的空中战略和秘密战争的起源	69
第五章 一场新战争中的盟友	89
第六章 美国的军事战略和中国国民党人	103
第七章 重庆阴谋	126
第八章 要将军还是要委员长?	148
第九章 和延安的接触	177
第十章 联络失败了	201
第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 反革命势力蠢蠢而动	232
第十二章 日本投降	253
第十三章 回过头去探究未来	291
索引	305

## 序

ix

中国几乎在连续二十年内同时遭受外侮和内战的苦难。1931年9月日本霸占满洲和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都是中国的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这两段历史事件也标志着美国同中国的命运大规模地纠缠在一起的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到三十年代后期，美国的领导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胜之日，就是日本直接向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利益范围及其盟国开始发动攻击之时。另一方面，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显然又使中国沦陷在苏联禁脔的铁幕之后。

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一片关注之情，交织着传教士的热情、改革者的理想和对无限广阔的市场的向往，既带好奇心，又往往说得娓娓动听。被含糊地解释的“门户开放”政策，除了表示希望俄国和日本都不要对中国建立霸权以外，还不能算作一项有效的计划。同时，美国的外交也依据这样的希望，即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将有助于逐渐形成一个按照美国示范的民主资本主义榜样建立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完整的国家。

在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以及日本发动的侵略，对本质上消极的美国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两股势力各以不同的方式首先开始使美国对中国抱有的希望受到挫折，然后又显然使中国本身成为对美国的威胁。1938年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危及美国及其在亚洲有殖民地利益的事实上的欧洲盟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制订

人日益把日本的侵略同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侵略联系起来。于是，他们根据新的方针制订了政策——一项旨在积极援助和支持蒋委员长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他们希望，美国的援助将使蒋介石能够抵抗日本的侵略，改善他赖以对付国内主要敌手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位。如果国民党当时获得了美国有关这种支持的保证，那么美国的自由派也希望该党将进行政治改革，以便使它成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和效率较高的政府；该党还有希望成为美国长期的盟友，并且能够帮助亚洲的政权从闭关自守的帝国有秩序地逐步过渡到自治和稳定的国家体制。

关心制订政策的美国人多数都认为这种见解的主要之点是正确的，但这种见解的内容广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互争雄长的官僚机构各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应用策略和解释中国各种事件时发生抵触。而且，1938年以后当中国内部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严重地损害了原先一致同意支持蒋介石以对付其国内敌人的立场。

等到美国参战以后，新的形势发展就甚至变得更加重要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在东北亚谋求势力范围的竞争者的出现，欧洲各帝国的崩溃，日本势力的可能消失，这一切促使一系列崭新的因素呈现出来，并影响已有僵化迹象的美国政策。此外，蒋介石的政权——美国希望它能继续执政——也受到战争冲击和美援的强烈影响。它被贪污腐化所削弱，于是它那本来就是脆弱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很快就输给了共产党人。

甚至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左右中国的中心问题还不止是革命的社会变革可能采取的方向。美国需要估量革命将对美国从三十年代末期以来就曾追求的目标产生什么影响。这些目标是否应该改变？不管改变与否，这些目标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呢？实现目标的办法是支持共产党人吗？还是支持国民党人或保

持中立呢？美国对于日益增长的苏联力量应当怎样作出反应？不幸的是，美国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缺乏连续性的、互相矛盾的，并且几乎完全不能获得积极的结果。

美国不但制订了一项不幸的政策，而且把自己困在这项政策里面，从1938年到1945年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尽管中国的内战到1946年才爆发，到1949年才结束，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定下的政策框框，使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及其后在亚洲兴起的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所应采取的政策格局受到了限制。我相信本书对美中关系史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在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政治事件并阅读了新的原始资料以后，我修正了关于这段时期的许多权威性的解释。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献有些是质量非常高的。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发表了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纷》)、查尔斯·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史》)、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及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体会》)等人的著作，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研究著作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许多问题上我对他们的看法没有异议)，但我的解释和结论往往同他们不一致。

除了塔奇曼反映自由派对越南战争感到失望的作品外，其他都是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写成的。这些著作表明了冷战自由主义的十分显著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中苏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并且假定一切革命都是阴谋。这些著作一方面过分强调美国外交手腕的幼稚，同时把政策的失败几乎仅仅归因于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这种勾心斗角把好心肠的、理想主义的但摇摆不定的美国政策搞得一团糟。 xii

根据以前一些研究著作提出的重要情况，本书探索了几个基本的但未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的保守民族主义要向关注

亚洲前途的美国设计人员要求帮助呢？是什么因素使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抱有偏见呢？为什么美国各派力量会卷入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去？卷入的深度又如何？如果罗斯福总统或史迪威将军的政策得到实现，会不会对中国的进步有所帮助？或者是否会导致现代军国主义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实行更“有效的”专政？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1945年以来留给中国人民和美国的亚洲冲突的遗产。

有许多个人和机构曾对我的这个研究项目给予帮助。尤其是国家档案馆现代军事部、马里兰州苏特兰的联邦史料中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胡佛研究所、海军史中心、军事史中心、俄克拉何马大学西方史收藏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帮助我获得接触资料的机会最多。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多次馈赠我研究经费。手稿的打字工作是由威拉迪恩·斯蒂克尔夫人和玛丽琳·布雷戴安夫人完成的。

我谨向在我写作阶段审阅稿子并提出意见的朋友和同事表示最真挚的谢忱。我感谢下列教授：布雷德福·珀金斯（他是这篇学位论文的指导者）、多萝西·博格、艾伯特·福尔沃克、欧内斯特·扬、玛丽琳·布拉特·扬、罗伯特·舒尔津格、威廉·卢滕伯、伦纳德·丁纳斯坦因。书中难免有错，应由我个人负责。

xiii 第四章的素材最初在《美国季刊》第二十八卷（1976年春季号）第一期发表。第十一章有一部分最早在《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四十四卷（1975年11月）第四期发表。作者对允许利用下列资料致谢：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特许引用亨利·史汀生文件。

## 中国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它那精彩奇异的语言和文化，它那潜在市场的诱惑力，象磁石一般从太平洋彼岸的地平线上吸引着美国人。英国获得的鸦片战争(1839—1842年)胜利，为进入这个与世隔绝的中央王国扫清了道路。西方列强和日本在那个世纪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不断发动进攻，尾随这些进攻而侵入的是商人、传教士、淘金猎财的士兵以及旅行家。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一项条约，即念起来相当费劲的“治外法权”这个名词\*所体现的条约，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豁免权。中国沿海及内河两岸的西方型城市，即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最后总数达到几十个)，由于受到特别保护和享有特权的刺激而得到发展。中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独立地位逐渐悄悄地丧失了，终于只占据一种烟雾弥漫的、仅仅尚未正式称为殖民地的地位。

由于美国的士兵和水兵没有参加二十世纪以前的几次对华战争，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美国要求并取得其他国家向中国政府勒索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这一事实，看来仅仅是细枝末节问题。很多人历来都肯定地认为，美国通过派遣传教士、教育家、商人以及捍卫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占领土的友好外交官而帮助了中国。当中国的革命志士在1912年推翻腐

---

\* “治外法权”的原文为extraterritoriality，在英语中是最长的词。——译者



2 朽的清朝时，华盛顿想必支持过新的共和政府。这种趋势以美国在1928年承认蒋介石的新政权——中华民国——而达到顶点。

有关中美关系的权威说法，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作出什么解释。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一切中国人向美国移民，从这个法案里不容易看出中美的“特殊关系”。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三十年代遍及全中国的排外和反传教士的地方性骚动中，这种关系也表现得并不明显。实际上，美国人并不理解使他们同中国社会产生真正隔阂的巨大的文化差距。1949年当中国的“百年奇耻大辱”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告结束时，美国最显著的反应是一片沮丧之感，认为中国人已经背叛了他们的恩人。在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将永远不再是“受屈辱的国家”的时候，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理解他的意思。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种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混乱席卷中国。随着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消逝，各种受压抑的社会力量、互相倾轧的民族主义派别以及勾心斗角的帝国主义势力，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场。然而，除了在中国内地布道的少数传教士外，中国史诗般的战斗事迹完全没有被美国人注意到。甚至那些确实身居中国的美国公民也大部分只是逗留在通商口岸，同一些并没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打交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大部分在华的活动交给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这些私人去进行。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市场仍然是一种幻境，因为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贸易还不超过美国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三。在三十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仍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1931年)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正如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一篇分析舆论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大多数亚洲人顶多不过是“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sup>①</sup>

然而，在英国进攻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间，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动在中央王国出现了。帝制腐朽没落了，人口激增，内战迭起（例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军叛乱，据估计屠杀了两千万人！），地方割据和外来压迫日益加剧，于是，那时存在的制度完全遭到破坏，到了1912年，终于基本上土崩瓦解。从清朝覆没到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四十年间，中国的五亿农民遭受了似乎是无止无休的内忧外患。农民深受其害的匪乱、军阀暴政、贫穷、疾病以及苛捐杂税，交织成没有几个美国人所了解的真正的中国。

群众中产生的社会危机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多地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演变及其最终与美国的关系。然而，几乎所有当代的美国观察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中国的人口已接近五亿，自耕农和雇农占百分之九十，其中三分之二可以列为“贫农”，他们拥有或租佃一小块耕地进行耕作，但收获的产量尚不够糊口。贫农以及境况即使好一点的农民，也要接受生活中三项沉重而又严酷的负担：地租、赋税和高利贷。佃户往往把平均百分之四十五的收成拿去交租；什么东西都要纳税，从土地直至饭锅和门窗。在敌对军阀的必争之地四川省，已经把应该在1971年缴纳的税在1933年征收去了！为了交租纳税，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贷者举债，而高利贷者则往往身兼收租人或收税人。高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年利率是司空见惯的。在农村，地主豪绅往往充任民政当局，这在旧的帝制及其后继的制度下一概如此。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在地方一级干脆把当时的上层名流吸收进党政机构以发挥其权威作用。由此产生的阶级压迫和政治压迫使法国的社会史学家和汉学家吕西安·比昂科得出结论说，在中国，“贫穷、凌辱和夭亡是将近五亿人民仅有的前途”。<sup>②</sup>

只有极少数的新闻记者和传教士见过并了解这些情况。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美国的外交官对于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基本上

不感兴趣或毫无所知。他们住在北京、南京或其他几个西方化的城市，对中国广大内地的情况不甚了了。他们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商业利益。华盛顿的官员把中国看作那些在太平洋具有利害关系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工具。他们十分注意日本和苏联在中国的一举一动，或可能来自激进政治运动的潜在的威胁。国务院难得参与制订的任何应急的计划，也几乎没有预料到局势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化。

1912年清朝的覆灭和民族主义运动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都要求大国达成新的协议，以维护远东的均势。在促进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各项条约的缔结和巴黎公约即凯洛格-布里安公约的签订(1928年)以形成新程序结构方面，美国起了主要的作用。根据几个华盛顿条约的条款，西方的主要大国(不包括苏联)和日本同意限制海军的计划，承认殖民地现状以及在中国发挥经济和政治影响时采用和平竞争手段。四分五裂的中国不得不继续容忍治外法权以及十九世纪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虽然在二十年代中期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政治和军事大动乱使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乘机进行干涉，但那些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仍旧有效。国民党的蒋介石将军在1927年清洗了他以前的共产党盟友和苏联顾问，这使列强消除了疑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干涉了。蒋的克制的民族主义和为赢得西方支持而作的努力，把某些不友好的观察家给他戴上的“赤色将军”的帽子摘掉了。

重新声明立场的中华民国的这位领袖，依仗他皈依卫理公会教会并同孙中山博士遗孀的妹妹、在韦尔斯利学院受过教育的宋美龄结婚，进一步赢得了声誉。他扭转了鼓动反教会的倾向，吸收了美国传教士去协助他实施思想政治的改革计划、即所谓新生活运动。缔约各国为了答谢蒋的温和克制，同意给予中国所要求

的关税自主权，并答应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其他条款。但是，新政权在中国开创的稳定局面不久就被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和国内的危机所动摇。日本由于迫切需要新的市场和原料，又惧怕蒋在重申国家主权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乃开始对中国的领土发动武装进攻，这场进攻后来终于酿成了太平洋战争。

当美国经受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日军进攻了满洲。当最大的工业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时，远东发生的事件似乎显得遥远而不大重要了。同情东京的美国人为数不多，认为美国应当直接进行干预的更少。1931年9月，使亨利·史汀生国务卿和赫伯特·胡佛总统大吃一惊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命运，还不如说是列强夺取新的势力范围以摆脱经济萧条危机的幽灵。如果日本或其他国家认为华盛顿条约或巴黎公约的限制未尝不可以置诸脑后，那么经过精心平衡的世界稳定局面也就完蛋了。

这时，美国政府、国会和舆论(比方说民意测验)都似乎不想反对日本。许多美国人希望东京的“温和派”会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占据上风。另一些美国人知道，美国简直就缺乏同日本在太平洋对抗的决心或军事手段。史汀生和胡佛就反映出这类态度，他们决意采取以高度道义标准为出发点的外交行动。1932年1月，史汀生宣称，美国不会“承认任何可能是利用与巴黎公约相抵触的手段搞出来的局面、条约或协议”。总之，华盛顿拒绝承认日本控制满洲的合法性或未来的任何领土掠夺。<sup>③</sup>

但是，对于日本侵略的反应基本上只限于“不承认主义”，即1932年的史汀生主义而已。美国宣称，从政治上和道义上看，它认为东京的政策是可恶的，但不值得用战斗来解决问题。稍后，国务院那位比较自负和坚持己见的亚洲问题专家斯坦利·项白克的评论具体地解释了这一观点。虽然美国十分同情中国的遭遇并

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但美国援助中国和在亚洲扮演圣诞老人却没有好处。<sup>④</sup>因此，当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在1933年5月最后达成停火协议，从而至少暂时使日本停止在中国深入地向南挺进时，美国的政策制订人感到宽慰。

在中国内部，人们希望新就职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法修订美国政策的念头，至多不过是受到假象的迷惑。尽管罗斯福喜欢引人入胜地向他的听众大讲他祖父在中国经营时的丰富多彩的历险故事，他却无意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毫无疑问，在1937年以前，罗斯福优先考虑的一项外交政策是避免同日本冲突，限制任何对抗的危险。这种做法无异是给中国政府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它想得到任何物质援助来对抗日本的希望落空。原来，罗斯福同他的大多数顾问一样，认为中国的命运对美国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并且美国也没有责任帮它摆脱困境。

早期的观察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地和私底下大肆奉承国民党的中国。而在1937年以前，关于蒋政权的大批官方报告是对该政权深表不满的。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经常抱怨国民党对事情的轻重缓急考虑不当。当日本继续从满洲向南进逼时，蒋坚持用他有限的武装力量去进攻中国中南部同他作对的军阀和共产党人。1933年，纳尔逊·詹森大使曾要求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银行家，曾当过一个时期的财政部长）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以抵消共产党人的号召力，但他的请求遭到了反对。孔向他指出，解决农民不满的办法是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围剿赤色分子。<sup>⑤</sup>

孔的这句名言很可以用来说明整个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情况。在所谓南京十年（1927—1937年）期间，中国在各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实际上真正代表政府的国民党能牢固控制的只有两个省份，部分地控制八个省份。其余十八个省都在独立或半独立的

地方官员或军阀的统治之下。正式政府行政机关和官僚机构仍然是虚弱的，并且缺乏明确规定的权限。在地方一级，国民党依靠老牌的社会名流的支持，这些人通常是地主，从而使农民疏远了国民党。党内的权力落入簇拥在蒋介石周围的范围越来越小的一伙人手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掌握了几乎是独占的权力。

委员长通过圆滑地操纵党内的派系来实行统治，怂恿他们彼此敌对，从而防止这些派系结成力量强大足以向中央挑战的任何联合组织。这也就使国民党陷于四分五裂，不能有效地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政府的政策仅能在少数地区、特别是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村居住着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大部分都不在南京的统治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影响地租、税收和高利贷的法律的示范性改革获得了通过，但各省的地方官员和地主照例置之不理。蒋的统治集团既不可能也不愿意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归根到底，他们自己也可能在社会和经济的深入改革中成为首批的牺牲者。

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而是倡导了一个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得意杰作。这个新生活运动用保守的儒家学说和某些基督教教义的陈词滥调来装点门面，要求中国人民尊重当局，不得当众吐痰，要端正各人的举止姿态。蒋介石似乎有一种企图用以激发热情的幻想，那就是关于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幻想。在他自己的领导下，他将缔造一个以军事实力为力量源泉的统一的中国。无论经济现代化还是社会变革，在这种转变中都是没有位置的。

保守的和军国主义的政权基调在国民党各派中都有人附和。CC派（这是以该派头目陈氏兄弟的姓名命名的）、蓝衣社、政学系、黄埔系以及其他派系都遵循蒋的主张。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

意识形态冲突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他们各自想控制政府的某些部门——军队、秘密警察、教育、宣传、官僚政治等部门。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影响蒋委员长，但并不谋求改变他领导中国的方向。<sup>⑥</sup>

三十年代中期，最能集中表现中国的内部混乱局面的，莫过于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长期战斗了。尽管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一场革命的内战一触即发。美国的外交观察家认为，中国抵抗东京的任何力量都将需要某种形式的团结。192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建立起他的最高领导地位，这主要是在清洗第一次统一战线联盟中的共产党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到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的残余力量在毛泽东领导下已在江西省的丛山峻岭中建立了新的苏区根据地。那时蒋宣称，消灭苏区根据地是他的当务之急。在随后的四年间，委员长在一系列大规模的无法取胜的“剿匪”战役中，投入了他的大部分武装部队去进攻红军。

中国的内战是在内地进行的，所以美国人很难获得第一手的情报。有关共产党人的报告，大部分往往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从国民党方面收集来的。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至少有两个领事馆官员设法向国务院发回报告，明确了革命斗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埃德蒙·克拉布在1932年写的一份长篇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的“温床”是贫穷，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克拉布还说，国民党不愿意、也不可能帮助贫苦的农民群众，它既可能被日本人赶下台，也可能被共产党人赶下台。<sup>⑦</sup>

驻汉口的总领事沃尔特·亚当斯在1934年给克拉布的报告作了补充。亚当斯偶然有机会读到了毛泽东的影响颇大的在江西苏区所作的报告之后，他认为自己有证据就“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提出一套新的看法。他据理说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完全受苏联的操纵，也并非象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掩护土匪

活动的招牌。恰恰相反，它是日益赢得人心的革命运动，并“因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困难而具有不可磨灭的中国特征”。亚当斯预言，“既然产生颠覆性活动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努力必将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他进一步阐述说，即使毛泽东的总部江西苏区被摧毁了，共产党人也会在新的地区开展游击战。<sup>⑧</sup>

克拉布和亚当斯的述评在国务院内部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人们盲目地相信，一切共产主义运动都是莫斯科的产物，所以有关 10 中国共产主义的实地报告都送到国务院的俄国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手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报告到了他们的手里都被归档存案，谁也不会把它们放在心上了。然而，克拉布的遭遇却并不止于此。过了许多年，即在1950年，他竟被宣布为政治危险人物，并且被解除公职，其部分原因是他在1932年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被判定为过激。<sup>⑨</sup>

1934年，随着内战的扩大，美国对共产党人的关心也增加了。蒋在江西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迫使共产党人开始了历时一年、行程六千英里的退却，这就是后来闻名的长征。长征开始时队伍有十万人，在到达偏远的陕西省之前，将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员在途中牺牲了。193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他作为这部史诗的作者（也是毛泽东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而一举成名。不过，甚至在他这部书出版之前，一些外交官员已经力图查明共产党人退却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结果。如果共产党人仍旧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保存下来，蒋介石就可能继续使用武力攻击他们。如果他们已经被消灭了，那么蒋就可能最终把注意力转向华北的日本人。<sup>⑩</sup>

1936年，中国内部的问题以及中日之间的问题又加剧了。共产党人坚守他们在陕西西北部的根据地，而蒋介石则调兵遣将，



重新对他们发动进攻。同时，日本人也采取了更加好战的政策。1936年11月25日，当东京参加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反共条约组织时，它已经明白表示要加强它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日本人显然打算以镇压共产主义作为另一个借口来加紧霸占中国。

尽管日本人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断加剧，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努力想要消灭共产党。1936年12月，他采取了重大步骤，  
11 飞往西北的西安市。他来这里是要督促踌躇不前的满洲军阀、国民党原先的盟友张学良加强对当时总部设在延安的共产党人的很不得力的讨伐。1936年12月12日，南京传出消息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了，张逼他放弃内战，接纳共产党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sup>①</sup>早些时候，共产党人就曾要求结成这种联盟，现在他们得到了国民党营垒内一部分力量的支持。

在此后两周内，中国的政局和美国人的情感发生了一种微妙的但非常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国内和西方国家的首都，有人认为，尽管蒋介石有许多缺点，他仍然是可能领导统一的国防力量以抵抗日本是唯一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具备巩固的基础，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竞争者甚至比他不更不想对抗日本。经过一番调停排解，直接或间接参与西安事变的各方企图使蒋回心转意，同意他们认为统一战线非常重要的主张。

西安的这出戏造成了一种奇特的联盟，这一联盟以很不正常的形式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中国共产党人派代表去会见委员长和逮捕他的人。显然，共产党人劝告后者不要杀蒋介石，而蒋本人则被迫参加抗日阵线。那时，从苏联传来了公开和私下的警告，说是如果把蒋处死，那将“削弱中国的抗日防卫力量”（从而也将削弱莫斯科的防卫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的两个最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从旁帮助救了他的命，使他免遭妒忌他的人的毒手，并且把他变成中国